

A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In the center-right, a wooden bridge with railings spans a body of water. A person is walking across the bridge. To the left, there's a large, dark tree and a curved stone wall.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hazy and warm-toned.

悲喜边缘的旅馆

〔美〕杰米·福特 著 郭莉 译

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

悲喜边缘的旅馆

〔美〕杰米·福特 著 郭莉 译

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喜边缘的旅馆 / [美] 福特著；郭莉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0.12
ISBN 978-7-5442-4973-7

I. ①悲… II. ①福…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817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127

HOTEL ON THE CORNER OF BITTER AND SWEET © 2009 By Jamie For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悲喜边缘的旅馆

[美] 杰米·福特 著
郭莉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特邀编辑 任国芳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73-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献给我的爱侣丽夏

我可怜的心多愁善感
它不是木头做的
我爱得那么深，真糟。

——艾灵顿公爵，一九四一年

致中国读者

我是中国人。大学一年级的一天，在填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时，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表上有一栏是填种族的，勾选的格子有“亚裔”和“白种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所以我各占一半。各占一半的格子在哪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此前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很少感觉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差一点就选了“白种人”。

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与父亲、祖父不一样，我不会说广东话，而且我姓福特（这个容易造成混淆的姓是一八六五年我的曾祖父郑民来美国淘金时随便选的）。况且，我从没到过中国。你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我距离中国最近的时候了。希望这一状况会很快得到改观。

然而从小到大，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所有的班级合影中，我都是那个异族模样的小孩。我总与别人有点不一样。记得读小学时，我的白人同学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们家过圣诞节吗？”当然过，但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祖父母家，吃年糕。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呢。

回想起来，我是在一个相当典型的华裔美国家庭长大的。我们吃米饭比吃土豆的时候多，银餐具旁边总摆着筷子。客厅里放的是东方

塑像——弥勒佛、莲花坐佛、接引佛，什么都有，尽管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大量的中国图片、日历、灯具和樱桃木雕花家具，和谐地构成了我父母家中七十年代的装饰风味。

在美国人看来，美籍华人的谋生方式好像都是一个路数。父亲也没能脱离这个俗套，他经营着一家中国餐馆，副业是教武术。如果你去过美国一家“正宗的”中国餐馆——在那里，从大厨到洗碗工都来自香港，只有收银员会说一口“洋泾浜英语”，满地都是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好像他们就住在那里一样——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在大多数美国孩子还都吃不惯甘蓝菜的时候，我已经在吃凤爪、海蜇、海参和我最爱的零食鱿鱼干。周末我会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图的唐人街吃点心，而不是一辈子只有在学校组织郊游时才去上那么一回。

这样就够了吗？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看着那些助学贷款申请表格，我慎重地考虑着要不要勾选“其他”一格。

身为作家，我过去许多年创作的故事中都不涉及东方人物——这些作品也从未得到发表。我努力想写出流行的东西，而非只是关注个人。结果一败涂地。可我仍刻意回避写中国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会有人愿意看，但主要还是由于我担心自己不够“中国”，讲不好这样的故事。我没找到自己的声音，我没弄清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我是谁。

可是后来，父亲过世了。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

父亲出生在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家庭，自幼家贫，他是家中独子。正因如此，我从小到大身边并没有中国姑姑、叔伯和堂兄弟。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祖父母此前已经辞世），我感到自己远离了中国传统，只剩下文化上的空虚感，以及“福特”这个姓。

于是我开始探究父亲的儿时故事。

故事之一，是关于那枚他被迫戴上的胸章，上面写着“我是中

国人”。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他告诉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头，骂他“小日本”。他告诉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场架，而那胸章是一种自卫方式。

他还谈到，他读的是一所种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学校。学校里有白人小孩、菲律宾小孩、韩国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有一天他去上课，发现一半的桌子都空了。日本小孩都被送去了拘禁营。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的这个故事，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在他成长的年代里，日裔美国孩子和华裔美国孩子一道上学，一道玩耍，而他们那些旧世界的父母，充其量只是困惑地旁观，糟糕的则会横加干涉。他的成长，伴随着中日之间种种冲突的回声，而他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白人却认为“他们看上去长得都差不多”。

他的经历，再加上我自己在种族认同上的不安和困惑（感觉好像一只脚牢牢扎根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有时候还被迫要作出选择），促使我写出了《悲喜边缘的旅馆》。一个有着事实基础的虚构故事。一个描述个人冲突的家庭故事。一个中国小男孩长成“美国人”的传说。

在小说创造过程中，我对我父亲，对他的童年，对他的过错和奋斗，以及对他的欢乐，都有了更好的了解。我多么希望他仍在世，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①和父亲不同，我没有胸章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他人“我是中国人”。不过没关系，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知道我是谁。

杰米·福特

^①他也一定会喜欢我的婚礼。我和他一样，娶了一个白人姑娘。但我们是在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8分结婚的。我想，我终究是一个中国人。——作者注

巴拿马旅馆

(一九八六年)

年老的亨利·李怔怔地站在那里，巴拿马旅馆前发生的纷乱令他有些困惑。原本只是有个电视新闻节目组，一群看热闹的人在好奇地围观，慢慢地，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逛街购物者、观光客还是朋克打扮的街头少年都加入进来。大家都想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亨利站在人群中，手里拎着的购物袋垂在身侧。他有种旧梦初醒的感觉——一场他在儿时做过的梦。

他这一生中来过这个古老的西雅图地标两次。第一次来时他才十二岁，那是一九四二年，他喜欢将那些年头称作“战争年月”。那时，这座古老的单身旅馆是西雅图唐人街和日本城的分界。这是两个展现着旧日仇怨的地方，中日移民几乎从不相互交谈，可他们那些生于美国的孩子却总在街上一起玩踢罐子的游戏。这座旅馆一直是一处绝好的地标，一个绝佳的见面地点，正是在这里，他与一生的挚爱相见。

第二次就是今天。一九八六年。什么，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当岁月无声滑过并变作回忆，他已经停止了对时间的计算。总之，这两次对巴拿马旅馆的造访就如书挡般矗立两端，而中间，已是她一世的

光阴。结婚。生了一个不懂感恩的儿子。癌症。葬礼。他思念六个月前辞世的妻子埃塞尔。但是，他对她的思念并非想象的那样强烈，也并非乍一听上去那么痛苦。那更像是静静地松了一口气。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不，应该说很差。生在她骨头里的癌，有着将人彻底击垮的力量，不只是击垮她一个人，而是他和她两个人，他想。

过去七年里，他喂她吃饭，给她洗澡，带她去厕所，再带她回来。他没日没夜服侍她，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他的儿子马蒂认为早就应该把母亲送进疗养院，但亨利绝不能接受。“除非我死了。”亨利这样反对。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尽管这是他反对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是亨利这一代人无法轻易丢下的文化遗存。他从小受的教育已经根深蒂固：要亲力亲为地照顾自己所爱的人，绝不允许把他们送进疗养院。而亨利的儿子马蒂永远无法理解的是，没有了埃塞尔，亨利的生活深处会裂开一个大洞，冰凉孤寂的风从那里吹出来，寒彻骨髓，似水流年就变成了鲜血，从永不愈合的伤口中汩汩淌出。

如今，她已一去不返。亨利认为应该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安葬她，有斋供，有寿衣，做几天几夜的法事，而马蒂却打算让她火化。他真是够现代。因为母亲的过世，他一直在接受心理咨询，并加入了一个网上的互助小组。谁知道那是什么。上网找人说话，听起来就像是没人可说话一样。是的，关于这一点，亨利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切身体验。那就是孤寂。几乎和他安葬埃塞尔的西雅图湖景公墓一样孤寂。她现在有着观赏华盛顿湖的绝佳视角，比邻西雅图的其他知名华人，比如李小龙和他的儿子李国豪。但最终，他们每个人所得不过是一块僻静的墓地。还有，永恒的孤寂。你的邻居是谁已经无关紧要，反正，他们永远也不会和你交谈。

夜幕降临的时候，亨利会和妻子说说话，问问她这一天过得如何。当然，她永远不会回应。“我可没有疯或怎么样，”亨利自言自语，“只

是放宽了心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有谁在听。”然后他忙碌着修剪起他的蒲葵和万年青。从这些盆栽的棕黑色叶子可以看出，他已经好几个月疏于照料它们。但现在他又有了时间，有时间去使之重新茁壮生长。

偶尔，他也会关心统计数字。倒不是关心夺走了他心爱的埃塞尔的癌症死亡率，而是自己。在人寿保险公司的精算表格上，他还有多少时间？他才五十六岁，在他看来，自己还年轻。但他曾在《新闻周刊》上读到，他这个年纪的丧偶者，健康状况会不可避免地下滑。也许，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他无法肯定，因为自从埃塞尔离去后，时间似乎变得异常缓慢。

他此前已同波音公司签署了提前退休协议，所以现在有着大把时间，只是找不到人和他共享。在凉爽的秋天傍晚，再没有人陪他一起走着去万喜饼屋买胡萝卜口味的月饼。

现在他来到这里，独自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生的光阴退去，他又一次站在巴拿马旅馆门前，走上去布满裂缝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这台阶让这家旅馆看上去更像是装饰主义风格的小客栈。像亨利一样，它也好似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亨利仍感到紧张和兴奋，就像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每次走过这里一样。他从市集上听到一些传言，于是从南杰克逊街的音像店逛到了这里。刚开始，看到人越聚越多，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但没有任何明显迹象，没有警笛的呼啸，没有警车顶灯的闪烁，只有人群潮水般涌向旅馆。大家艰难地移动着脚步，一步步往前挤。

他走过去的时候，另一个新闻节目组正好抵达，他便跟着他们往里走。羞于面对摄像镜头的旁观者纷纷退向两边，人群分成两半，让出了一条路。亨利紧跟在节目组后面，小心前行，以免踩踏到别人或是被人踩到。人群在他身后很快合拢。大厅里，站在台阶顶端的旅馆

新主人宣布：“我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一些东西。”

找到了什么？一具尸体，还是某种毒品实验室？不，如果旅馆成了犯罪现场，警察早就在这片区域周围拉上警戒线了。

早在易主之前，一九五〇年，这家旅馆就用木板封了起来。那些年，唐人街成了来自香港、澳门的帮会团伙前往避难区的入口。白天，国王大街以南的街区有着引人入胜的风貌。游人们在仰头欣赏古色古香的带卵锚花饰的建筑时，往往忽略了人行道上的脏乱和破损。郊游的孩子们穿戴着色彩缤纷的外套和帽子，手拉手走在路上，被橱窗里色泽鲜艳、刺刺冒油的烤鸭诱得垂涎三尺。但到了夜里，大街小巷出没的却换作毒贩以及为了一小袋白粉出卖色相的枯瘦中年娼妓。想到儿时心目中的圣殿曾变作毒窟，亨利感到阵阵哀痛。他握着埃塞尔的手，看着她缓慢、悠长地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也曾是这般哀痛。

视若珍宝的东西似乎已经远去，不再回来。

正当他摘下帽子用破帽檐给自己扇风时，人群开始向前拥挤。闪光灯不停地闪烁。他踮起脚尖，越过前面高个子新闻记者的肩头望过去。

是旅馆的新主人，一位苗条的白人妇女，年龄可能比亨利稍微小一点。她走上前来，拿着……一把伞？她把伞撑开，亨利一看，心跳便有些加速。是一把日本阳伞，竹子材质，涂着鲜艳的红白两色，上面绘有橙色的锦鲤。旅馆主人迎着记者们的镜头，转动起这纤弱易碎的工艺品，一片薄薄的尘雾旋出并飘散在空中。又有两人抬上一个扁皮箱，上面贴着外国港口的标签：东方海军航线，自西雅图、横滨和东京。一侧署着“Shimizu”^①的名字，是大大的白色手写字母。箱子在好奇的人群面前打开了，里面有衣服、相册和一个老式的电饭锅。

① 日语“清水”的发音。

旅馆的新主人解释说，她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三十七个日本家庭的物品。她猜测，这些日本人是受到了迫害，并被带到了其他地方，而他们的物品却从此隐藏起来，不见天日——这简直就是战争年月留下的时光胶囊。

亨利默默地看着一小批板条箱和皮箱被拖上楼梯。人群开始为里面那些曾被视作珍宝的物品发出惊叹：白色的圣餐裙，黯淡无光的银质烛台，野餐篮，一件件尘封了四十年的物品保存下来，是为了那从未到来的更快乐的时光。

亨利越是去想那些脏旧的小玩意儿、那些被遗忘的珍宝，就越寻思在那里能不能找到自己令人心碎的记忆。也许它就藏在那些无人认领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物件中。就锁在一座废弃旅馆的地下室里。遗失了，却永远不会遗忘。

马蒂·李
(一九八六年)

亨利将聚集在巴拿马旅馆门前的人群抛在身后，朝位于比肯山上的家走去。他家并没有远到可以俯瞰雷尼尔大街的景色，只是从唐人街上去不远，相当便利。一座由三间卧室组成的小房子，带有地下室——这么多年过去了，里面却仍然没有完工。他原本打算在儿子马蒂离家上大学后把它弄好的，但埃塞尔病情恶化，他们积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全都用来支付大笔的医疗账单了。账单像滚滚洪流，持续了将近十年。最后，他们及时赶上了政府的医疗补助，甚至有钱送埃塞尔去疗养院了，但亨利仍坚守着自己的结婚誓言：无论妻子患病还是健康，都要照顾她。再说，谁愿意在弥留的日子里还住在一个如同监狱、人人都排队走向死亡的公立机构？

亨利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马蒂敲了两下门，径直走了进来。他漫不经心地和父亲打了个招呼：“还好吗，老爸？”然后就朝厨房走去，“我马上就出来，你不用起身。我就是喝点水。我从国会山一路溜达回来的，锻炼锻炼身体。你自己也该考虑健身了，我感觉妈走后你好像长胖了。”

亨利看了看自己的腰身，按下电视的静音按钮。他一直在留心有关今天巴拿马旅馆重大发现的新闻，但什么也没听到。今天一定是个新闻过剩的日子。他的膝头放着一叠老相册和几本学校毕业纪念册，西雅图浓重的湿气已让它们变得污渍斑斑，散发着霉味。亨利家那间久久不能完工的地下室里，水泥板也在这样的湿气中变得冰凉冰凉。

他和马蒂自葬礼后就很少交谈了。马蒂仍在西雅图大学忙着攻读化学学位，这挺不错，好像让他躲开了很多麻烦。但大学也把马蒂从亨利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埃塞尔还在世时，倒也没什么，但现在，亨利生活中的那个大洞变得更大了，如同站在一个大峡谷边上高声喊叫，然后徒劳地等待着永不会有回声。马蒂也会回家，但他好像只是来洗衣服、给车打蜡或是找他要钱花——亨利总是眉头不皱一下就给他。

如果说照顾埃塞尔是亨利打的第一场仗，那么为马蒂支付大学学费则是第二场。虽然有一小笔助学金，马蒂仍需要依靠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亨利为了能全天照顾埃塞尔，已经从波音公司提前退休了。名义上，他有一大笔钱，看起来是个富足的人。因而放贷方认为马蒂的家庭有着殷实的银行账户，但他们对那些医疗账单并不知情。在马蒂的母亲去世时，他们剩下的钱仅够操办一场体面的葬礼，马蒂却还认为这样的花费没有必要。

亨利没打算告诉马蒂第二笔贷款的事，助学贷款耗尽时他还能用这笔钱供马蒂上完学。何必让马蒂为此忧心？何必让他承受这些压力？学业已经够艰难了。即便他们之间并无多少言语交流，亨利仍像所有慈父一样，希望儿子万事无忧。

亨利一直在看那些相册，看他学生时代的退色回忆，他在寻找一个从未找到的人。他想，我一直努力不要活在过去，可谁知道呢，有时候是过去活在了我身上。他把视线从相册上移开，看到马蒂端着一

个高脚杯慢悠悠地走进来，杯里盛满冰绿茶。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他移到他母亲留下的那张破旧的人造革躺椅上，正对着亨利。亨利呢，倒是很高兴看到埃塞尔曾经的位置又有人占据……无论是谁都好。

“那是最后一点绿茶了吧？”亨利问。

“没错，”马蒂说，“这最后一杯留给你，老爸。”他把杯子放在亨利身旁的绿玉色杯垫上。这让亨利意识到，葬礼后的这几个月里，他是何等衰老和刻薄。不是马蒂的问题，是他自己——他需要多出去走走了。今天是个好的开始。

即便这样，他也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谢谢”。

“很抱歉我最近没怎么回家。期末考试折磨得我都要喘不过气了。你和妈千辛万苦挣钱送我进了一流大学，我不能让那些钱白交。”

古旧的暖气炉停止了轰隆隆的工作，屋子里冷了下来，亨利却因内疚而脸红了。

“对了，我给你带了一点小礼物，表达我的谢意。”马蒂递给他一个大红色的“利是封”，正面有凸起的闪光金字。

亨利双手接过这份礼物。“红包——你是还我钱吗？”

儿子笑着挑挑眉毛。“差不多。”

里面是什么并不重要，亨利已经因儿子的这份心意而变得有些谦逊。他摸了摸金色的封印，上面印着汉字“福”。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叠起来的纸——马蒂的成绩单，他得了四分的高分。

“我是以优等生^①身份毕业的，也就是说，最高荣誉。”

一片静默，只有静音状态的电视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怎么了，老爸？”

亨利伸出生满老茧的手，用手背擦了擦眼角。“也许下一次，我

^①原文为拉丁语。

就可以向你借钱了。”他说。

“如果你想完成上大学的心愿，我很愿意为你付钱，老爸——我会让你拿到奖学金的。”

奖学金。这个词对于亨利来说有特殊意义，并不仅仅因为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尽管那也是原因之一。一九四九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学，成为一名绘图学徒。波音公司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在内心深处，亨利知道他退学的真实原因，那让他痛苦。他难以适应。过去那些年遗留下来的孤立感在作祟。这样的感觉，并不来自同辈人给予的压力，而更像是源于排斥。

他低头看着他的六年级纪念册，想起了这个学校里他恨过和爱过的一切。奇怪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映现，好像古旧的纪录片。校园里敌人不友善的目光，与纪念册里他们无邪的笑容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幅班级合影旁有一栏名单，写着那些“没合影”的学生的名字，亨利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他确实不在那一排排绽放笑容的孩子当中。但是那天他在那里。一整天都在。